

中国历史人物丛书

ZHONG GUO LI SHI
REN WU CONG SHU

★第六卷★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国历史人物丛书

第六卷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本卷目录

司马炎

- 一、司马氏家族的兴起 (3)
- 二、安抚王室,巩固政权 (10)
- 三、消灭东吴,一统天下 (15)
- 四、门阀政治 (27)
- 五、占田课田制 (34)
- 六、由俭入奢,荒淫腐败 (40)

司马睿

- 一、西晋的败亡与世族的南渡 (51)
- 二、东晋的建立 (61)
- 三、拓定江南 劝课农桑 (68)
- 四、偏安江左、无意北伐 (71)
- 五、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 (80)

刘裕

- 一、寒门庶族 (100)
- 二、北府起家 (104)
- 三、金戈铁马 (114)
- 四、宽租节役 (130)
- 五、代晋称帝 (140)

谢安

- 一、谢安与谢氏家族 (147)
- 二、谢安出仕 (151)
- 三、谢安的政治军事才干 (158)

四、淝水之战	(164)
五、淝水之战南胜北败的原因	(173)
六、谢安的“镇以和靖”	(185)

桓 温

一、桓温的家世	(195)
二、桓温的青少年时代	(200)
三、灭蜀汉	(203)
四、桓温以前的北伐	(207)
五、桓温第一次北伐	(212)
六、桓温第二次北伐	(220)
七、桓温第三次北伐	(224)
八、桓温专擅	(231)

司 马 炎

杨燕玲 编著

司马炎，字安世，魏青龙4年(公元236年)生于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泰始元年(公元265年)12月，司马炎通过禅让的形式，从魏帝曹奂手中夺得了帝位。因为他被封过晋王，所以国号“晋”，史称“西晋”，改年号为“泰始”。在位之初，为了稳定帝位，恢复了分封，公元280年，平定东吴，统一全国，晚年贪财好利，不图远谋。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夏天去世，安葬于峻阳陵，谥号武帝。

一、司马氏家族的兴起

西晋皇室司马氏，是河内温县大族，秦汉之际司马卬(áng)的后代。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曾任京兆尹等官，旧史说他“性质直公方，虽闲居宴处，威仪不忒”，“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素如也”，足见其家风礼法之严。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曾在曹操下面做官，他认为天下土崩之势，由于秦废五等封爵，五等之制虽不可复，宜令“州郡并置兵”，“又以为宜复井田”，井田不可复，“然州郡领兵，朗本意也。”司马懿，字仲达，就是司马防的次子，司马朗的弟弟。

曹操为司空时，曾召用司马懿而司马懿托病不至，及为丞相，再召司马懿，并命令征召的人，如果司马懿拒不应召，就将他抓起来。司马懿惧而应召，为文学掾(yuàn)，历官黄门侍郎、议郎、丞相主簿侍官。司马懿常与太子曹丕游处，为曹丕所信任，与陈群、吴质、朱铄等四人号称“四友”。曹操死后，曹丕

代汉称帝，司马懿历任侍中、尚书、左仆射、给事中、录尚书事等。曹丕临终时，遗命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共同辅佐明帝曹叡。曹真等相继老死，司马懿的权势越来越大，曾经都督荆豫二州和雍梁二州诸军事，升为太尉，西拒诸葛亮于秦陇，东灭公孙渊于辽东。曹叡临终时，又受遗命与曹爽共同辅佐齐王曹芳为帝，进位太傅，食邑万户，子弟 11 人皆为列侯，威势更加煊赫。司马氏和曹魏之间的权力之争，也日益尖锐起来。

和司马懿共同受遗诏辅政的曹爽，字昭伯，为已故大将军曹真之子，“少以宗室谨重”，为魏明帝所爱重，明帝临终，拜他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曹爽在他的谋士何晏、邓扬、李胜、丁谧(mì)、毕轨等人的谋划下，觉得司马懿的威权太重，于是以何晏、邓扬为尚书，何晏专掌选举，毕轨为司隶校尉，李胜为河南尹，政事不经过司马懿，以削弱其权势。曹爽的弟弟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掌管禁军。曹爽既掌握了军政大权后，司马懿就装病在家。不久，李胜由河南尹出为荆州刺史，向司马懿告辞，且借以刺探情况。司马懿更伪装病危，令两婢扶持，拿衣服则衣由手中掉落，饮粥则粥由口边流出，沾满胸襟。李胜说将要出任荆州，则故意错听为并州，且向李胜说，年老病笃，死在旦夕，恐不能再见了。曹爽、李胜等竟真的信了司马懿的伪装，不再提防。

嘉平元年(公元 249 年)，齐王芳出谒明帝曹叡的陵墓高平陵，曹爽兄弟都随帝出城。司马懿乘此机会，上奏于太后，撤去曹爽兄弟职务，以侯归家。大司农桓范奔归曹爽，劝曹爽奉天子至许昌，传檄天下以讨司马懿，曹爽不能用，竟交出事权，

以侯归第。于是，司马懿通过合法手续，以谋反罪收捕曹爽兄弟及何晏、丁谧、邓扬、毕轨、李胜、桓范等，皆诛其三族。曹爽与司马懿的这次斗争，可说是曹魏灭亡、司马氏代魏的关键。曹爽虽为大将军曹真之子，但其能力识见和声望，远在司马懿之下，所信用的何晏、丁谧、邓扬等，又大都是华而不实，及至变起仓卒，应付无方，虽桓范、鲁芝等尽力替他策划，也不能用，因而惨败，从此，曹魏大权，落入司马氏家族手中。司马懿既杀曹爽等不久，太尉王凌曾为魏起兵，也被司马懿镇压下去。于是，增司马懿封邑五万户，其家为侯者 19，司马氏进一步控制了魏的朝政，威势益盛。曹操曾对儿子曹丕说过：“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晋书·宣帝纪》，不料被曹操说中。

嘉平三年，司马懿病死，他的长子司马师继掌大权，升为大将军，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集军政大权为一身。经过几次废立皇帝事件，司马氏终于代魏自立。

司马师，字子元，颇有才能，与夏侯玄、何晏齐名，后两人在政治上虽为司马氏的政敌，但何晏还是称赞司马师说：“惟几也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司马师）是也”。（《晋书·景帝纪》）司马师既代父掌权之后，曾经搜罗一些人才，培植力量。正元元年（公元 254 年），司马师以魏帝与中书令李丰、皇后父亲张缉等，谋用夏侯玄代替自己辅政为借口，杀掉李丰、夏侯玄等，皆夷三族，接着就废魏帝仍为齐王，而立文帝曹丕之孙，东海王曹霖之子高贵乡公曹髦（máo）为帝。既废曹芳的第二年，镇东大将军毋（wú）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于河南，反

对司马氏，但很快就被司马师镇压下去，母丘俭被杀，文钦逃奔东吴。司马师也随即病死。

司马师死后，弟弟司马昭代兄辅政。昭字子上，曾任洛阳典农中郎将、散骑常侍，议郎、中领军、卫将军，既执政柄，进位大将军，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执政的第二年，又加号大都督，进封高都公。甘露二年（公元 257 年），继母丘俭为镇东大将军的诸葛诞，又杀扬州刺史乐琳，起兵反对司马昭。司马昭用拥戴天子征讨四方的策略，奏魏帝及太后讨伐诸葛诞，于第二年 2 月，攻下寿春，杀死诸葛诞，并夷其三族。回军后，魏帝封司马昭为晋公，封地八郡，方圆 700 里。司马昭的威权，由此更盛，军政大权，进退百官，都在他的掌握中。魏帝曹髦，不胜愤慨。景元元年（公元 260 年），曹髦自率宫中兵士、僮仆讨伐司马昭，《三国志·高贵乡公纪》注引《汉晋春秋》说：

“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沈、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

但王沈、王业等都是司马氏的人，他们奔告司马昭。王经劝魏帝不能孤注一掷，如果这样，反而速祸。魏帝曹髦不听王经的劝阻，率宫中卫士僮仆不过数百人，前往攻打司马昭。司马昭早有准备，其腹心中护军贾充的部下成济，挥戈直刺魏帝，洞胸而刃出于背。魏帝曹髦被杀后，司马昭斩成济以掩人的耳目。而没有随王沈奔告魏帝亲自用武的王经，也被司马昭所杀。

曹髦死后，司马昭又立曹操之孙、燕王曹宇之子常道乡公

曹奂为帝，自然这也是个傀儡。于是司马昭进位为相国，增封两郡、合前共十郡。司马昭故作辞让之态。

景元四年(公元 263 年)司马昭派邓艾、诸葛绪、钟会等伐蜀成，次年即进封晋王，封地共 20 郡、并加九锡。古代帝王赐给有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九锡指赐予的车马、冠服、乐舞、朱户、纳陛、虎贲之士、铁钺、彤弓彤矢、柎鬯(chàng)等九种物事。古世权臣篡位之前，辄先赐九锡。司马昭既封王建国，就命司空荀颢等制定礼仪，中护军贾充修订法律，尚书仆射裴秀议定官制，而让太宝郑冲总其成。这是咸熙元年(公元 264 年)的事，反映出司马昭很快就要取代曹魏的帝位了。接着在第二年的五月，司马昭就建天子旌旗，仪仗乐舞皆同皇帝，世子改称太子。可是，没来得及戴上皇冠，就病死于这一年的 8 月。

司马炎，字安世，是晋王司马昭的长子，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成规，他本该是当然的王位继承人。但司马昭似乎忽略了这一位长子，而对另一个儿子司马攸更感兴趣。司马昭把司马攸过继给自己的哥哥司马师为子，并打算立司马攸为世子。他每次见到司马攸，便指着晋王的宝座对他说：“这是挑符(司马攸的小名)的座位。”宠爱之情可谓溢于言表。但这实际上暗示了对司马炎这位合法继承人的废黜。因此，司马炎虽身为王室长子，但命运向他展开的并非簇拥鲜花的路径，而是一条等待开拓的长满荆棘的艰辛之途。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不甘寂寞的司马炎开始了他争夺本该属于他的王位的活动。

据史书记载，齐王司马攸为人清和平允，亲贤好施，喜爱古代典籍，并且雅好文章，是有着浓厚的艺术气质的儒雅之士，但无奈司马攸面临的并非一场艺术的较量，而是一次严峻的政治角逐，它需要的既不是对古代典籍的修养，也不是谦谦的君子之风，而是胆魄与谋略。因此，谦和儒雅的天性不但丝毫无助于司马攸，而且更使得他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尤其是在具有强烈的权力欲的司马炎面前，显得那样被动，那样苍白无力。这样，司马攸虽然有父亲司马昭的眷顾，但在政治的漩涡中，仍如飘摇于风雨中的扁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与司马攸相比，司马炎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在气质上几乎完全秉成了父祖的天性，既有着足以左右形势的谋略，同时也有着一付宽厚仁慈的外表，更何况还有着立嫡以长这一堂皇的箭牌。总之，政治家的天性加上客观上的优势，使得他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游刃有余，大显身手。于是形势急转直下，朝廷中开始有人为司马炎出谋划策。如司马师夫人的弟弟羊琇总是把自己了解到的朝政内情预先透露给司马炎，使之与司马昭见面时，能够对答如流，深切司马昭的心意，博得他的好感。而当司马昭和群臣商量立世子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大臣都站在司马炎一边，本来光彩照人的司马攸顿时被这位兄长在政治舞台上映照得黯淡无光。司徒何曾也曾竭力为这位未来的皇帝说情：“中抚军（司马炎当时的职务）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而且长发垂地，两手过膝，非人臣之相。”这实际上向司马昭提出了这样的警告；司马炎并非平庸之辈，司马攸不是他的对手，即使强行将司马攸立为世子，也难保日后不发生变

化。而相国左长史山涛说得更为明确：“从历史上看，废长立幼往往是祸乱的根子。”这对司马昭来说无疑又是一记响亮的警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以强大的政治理智克服个人情感上的好恶，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立司马炎为世子。这样，司马炎在政治舞台上初试身手，就取得了胜利，从而为他登上皇位扫除了第一个障碍。

但司马攸政治上的失利并没有最终转移司马昭对他的偏爱，一直到临终之际，司马昭还为司马攸的命运担心，他怀着惆怅之情，拉着司马攸的手，把他托付给司马炎，然后抑郁而终。而对女性来说，这种同情弱者的侧隐之心更胜于男人，羊妃（司马昭之妃）在临终之际，泪流满面地对司马炎说：“挑符脾性急躁，而你做兄长的又不够仁慈，倘若我一病不起，你可能不会容他。现在我把他托付给你，希望不要忘记我的话。”羊妃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政治欲望对人性与人伦的摧残是无情的，它曾使多少人朝为手足，暮为仇讎。兄弟相残，同室操戈历来是宫廷斗争的主旋律。曹丕在登皇位后，不就对同宗兄弟、甚至至亲骨肉实行了残酷的乖离、杀戮政策吗？前朝的余响不能不是一个沉痛的启示。但司马炎毕竟是司马炎，他不是曹丕，前朝的遗训警告他，建立在血缘关系与宗法关系之上的封建集权一旦失去了家族的凝聚力，便会走向灭亡。他放过了司马攸。

司马昭死后，太子司马炎继立为晋王，魏的文武大臣都成为晋的文武大臣，如魏司徒何曾为晋丞相，魏镇南将军王沈为晋御史大夫，魏议郎裴秀为晋尚书令等。接着就在这年底（公

元 265 年)，重演了一幕曹魏代汉禅让的故事。

这一天，距洛阳不远的地方，祭坛高筑，群臣肃立，新皇帝司马炎以当年魏帝曹丕的同一口吻、同一种语言，向上天祷告，接受魏帝的禅让：“上天既有成命，辞让便有违天意。天序不能没有统帅，人神不能没有主宰。我司马炎躬承皇运，奉命受禅。”代魏称帝后，改国号晋，年号为泰始，都于洛阳。这样，司马氏家族经由司马懿、司马昭和司马炎三代人的苦心经营，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中原大地名符其实的统治者。司马炎，这位晋王朝的开创者，便开始了他的 25 年的皇帝生涯。

二、安抚王室，巩固政权

司马炎即位后，即封魏帝为陈留王，而曹魏宗室诸王皆降为县侯。追封司马懿为宣帝，司马师为景帝，司马昭为文帝。为了避免重蹈曹魏无皇室支持而灭亡的覆辙，加强皇室和世族的统治力量，保持政治特权，司马炎又恢复了分封制。泰始元年，分封皇族 27 人为王，之后又允许王国置军，这就是西晋初年著名的“泰始封王”。以后又不断增加，共封王 57 个。除了王国之外，还分封异姓公侯 500 个。诸王奉命出镇各地，拥有地方军政大权，可以自辟僚属。通过对王室的安抚，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司马炎对于父母时刻为之悬念的、他的那个政治上的敌手，同胞兄弟司马攸更是尽力恪守兄弟之道。在泰始封王时，他封司马攸为齐王，并允许他自己选国中的官吏。司马攸不敢

自选，最后全部官吏都请求司马炎指派。

司马炎很清楚，他虽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危机仍然存在。从内部看，他的父辈在给司马家族夺取皇位铺平道路的同时，曾经对曹氏家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这件事所造成的阴影至今仍然横亘在人们的心中，从外部看，蜀汉虽平，孙吴仍在，虽说此时东吴已不足以与西晋抗衡，但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内忧外患告诉司马炎，要想巩固获得的政权，进而完全吞并东吴，统一中国的大业，就首先要强固统治集团本身的凝聚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司马炎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诏使已成为陈留王的魏帝载天子旌旗，备五时副车，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同时又赐已成为阶下囚的山阳公刘康、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附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这不但缓和了朝廷内患，尤其消除了已成为司马氏家族统治对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惧，而且还安定了蜀汉人心，为赢得吴人的好感，进而吞并东吴取得了主动权。从历史上看，凡属亡国之君，到了新朝，很少不死于非命；凡是亡国旧臣，也都或面临死途，或在屈辱中度过余生。但司马炎对这两种人的处理并不如此简单，对亡国之君刘禅，包括以后的孙皓，他一方面在政治上严加管束，另一方面在生活上加以优待，使他们在安逸中消磨意志，度过余年。以至昏聩的刘禅说出：“此间乐，不思蜀”的话来。而对蜀汉旧臣，他也不一概杀戮或废黜，而是量才录用，李密之事很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李密原是蜀国的官吏，早年父亲亡故，母亲改嫁，与祖母

相依为命。他不但以孝闻名乡里，而且知识渊博，机警辩捷。无疑，这样的人才不但深切司马炎的心意，而且也能为朝廷和社会舆论所认可。河内司马氏向来以名教著名，司马炎之祖父司马懿便少有奇节，服膺儒教；父亲司马昭虽为人多险谋，他也始终未轻易抛弃名教这一传统工具，相反却以名教自任，他与东海宿儒王肃之女结为婚姻，即具有这方面的意味。作为这个家族的一员，司马炎也自然认识到名教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点辍意义。司马昭去世，虽从汉魏旧制，丧事从简，但司马炎自己却深衣素服，降席撤膳，哀敬如丧者，尽管不断有人提议改服进膳，可他还是礼终而后服吉。对宗教意识淡泊的中国人来说，祖先就是心中的上帝，具有无法取代、也无法抹煞的意义。所以，在封建时代，尽管思想不断变换色彩，崇拜祖先的意识有时遭受冲击，甚至出现欺祖之事，但最终不但没有泯灭反而有强国的趋势，这从早期儒家到宋明理学的伦理哲学中可以看出。可以说，崇拜祖先的意识，犹如一条中枢神经，始终维系着封建时代中国人的道德标准与精神价值，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皇帝也常常以“孝”与“仁”相配合，作为专制统治的外在形式，以实现人们对人们精神的制约。所以，当李密以尽孝为理由，拒绝司马炎的征召，并且上书了一篇令人悱恻、以至传诵至今的《陈情表》后，司马炎便借题发挥，大弹他的弦外之音。他不但嘉其诚款，还赐李密奴婢二人，令郡县供养其祖母。等李密终丧后，又诏令他作为司马氏家族的发源地河内温县的县令，优宠之情显而易见。

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艰辛、动乱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

一打下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作为当时最有权威、同时也最具有号召力的人物，司马炎更力求在大政方针中充分体现这一点。泰始四年（公元268年），他在所颁布诏书中明确指出：“古代虽有象刑之制，但人们并不触犯它，今天虽具参第之法，可奸邪之事不绝。德与行相去何远！先帝同情百姓的狱事，故命群臣考正典章刑法。为坚守祖先的遗业，永保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国颁下五条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对于类似的诏令，我们不能排除官样文章的因素，但也不能一味地看作浮词虚语，因为他的基本精神还是深切当时现实背景的，即针对曹魏后期苛刻的政治而言的。当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继东汉动乱政治以后，为了安定人心，恢复国力，曾实行了比较宽松开放，节俭务实的建国方针，但到了曹丕，政治逐渐严厉，社会风气亦向腐败转化，曹叡以降，魏武当年的风范已是昨日黄花，成了绝响，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断地把强大的物质负担转移到百姓身上，而连绵的战乱，更使百姓于惨淡的生计之外，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种恐惧与疲惫之感。因此，自魏至晋，除了魏初，在政治上还体现了一点可怜的曙光，整个历史进程都被淹没在血腥与黑暗的泥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为而治的强国方针，就不能不是一种真实的反叛，而这种反叛，又无疑暗示了一种新的历史精神的诞生。

在专制时代，尤其是在专制色彩比较强烈的古代中国，皇帝就是国家的象征。它不但是各种权力的凝聚点，而且还具有